

光明与黑暗诗意般地调和在一起

——谈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给名著二度创作带来的启示

吴小钧

早在二月中，有友人相约四月观看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见我反应有些迟疑，友人特意补充，是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名作改编的。我怎能不知道？我还听说该剧是在韩国“出生”的作品。

迟疑的原因是在群星璀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是个令我望而生畏的作家。如果说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亦包括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等），能让人在敬仰的同时产生一种想要拥抱的亲近感；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敬而远之，主要是源于其作品一贯的阴郁底色和极易使人产生的阅读困难（《白夜》除外）。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家“四部伟大小说之一”（另三部是《罪与罚》《白痴》《群魔》），其共同特征是“均拥有戏剧化结构、悲剧感的观念和哲理性的内涵”，均为“异常复杂的整体”。陀氏在这部酝酿十年左右、边写边发表、离世前最后的一部作品中，寄托了对俄罗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它的核心事件是发生在沙俄时期一桩真实的弑父案件，描写了老卡拉马佐夫同几个儿子间的尖锐冲突。通俗来说，前半部分交代人物、人物关系及事件前史；后半部则是关于角色的产生及“谁是凶手”的案审。整部小说的主题非常深邃，探讨的是情欲、信仰、理性与自由意志间的角斗，从而带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和人性悲剧。这是一部充满着深刻的思辨和复杂的心理、情感体验的作品。

十年前在全国大学生戏剧节上，上海戏剧学院曾邀莫斯科艺术剧院附属高等戏剧学校演出过据此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我们都是兄弟》，至今仍有印象：20个男女演员在演出的绝大部分时间始终在舞台上，他们既是与案情有关的人物，又是法庭庭审者和旁听者，或是歌队的演奏者；多名演员前后饰演同一个人物，甚至男女反串；演出相当重视文本（原著），经常出现大段独白和旁白。虽然这批学生的文学素养与表演天赋令人赞叹，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舞台空间处理：从幕启至幕落，舞台的中心演区就是法庭

学界关注

电影票价与市场关系之辨

李建强

电影票价与电影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广受关注，在电影新一轮的改革发展中，为了加强有效供给、拉动需求增长，促进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关系作一些深入的辨析。

电影票价是电影产品的性能值与价格值的体现，也是表征电影市场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二者的相关性表现在，只有在一定价格值的基础上，努力增加电影作品的性能值，做到价廉物美，物有所值，才能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2010年之后的十年间，我国电影市场不断扩大，从全国电影票房只有近102亿元，观众人次约为2.5亿，到电影票房达到642.66亿元，观众人次为17.27亿，市场规模扩大了六倍多。同样，电影票平均单价也由30元出头上升至40元左右。由是，电影票价和电影市场相辅相成，得到了同步发展和提升，形象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互补性。

需要指出，电影市场与电影票价的关系不是线性的、静态的。2015年以后我国电影票房总数连续多年大幅上升，但电影平均上座率却急速跌落：2016年为14%，2017年为13%、2018年为12%，2019年只有8%。人次规模坠落的原因当然较为复杂，但电影票价持续上涨肯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致饶曙光等专家一再呼吁：“降低票价可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为了中国电影长远发展，还是要把票价调整到符合观众消费预期的水平，这样才能够不断拉动观众走进电影院看电影。”

2023年春节档的实践很有说服力。档期平均票价为52.4元，低于上年同期价格。虽然票价低了，片时长了，场次少了，但观影人次达到1.29亿，同比增长13.16%；场均则达到48.37人次，远高于往年同期。最终档期内收获票房67.58亿元，同比上涨11.89%——电影制作、发行方和电影院主动让利观众，用经济手段调动市场，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由此可见，做大做强电影市场，绝非只有提高电影票价一种路径，消费价格的定制、消费结构的优化、消费品质的提升、消费内容的丰富、消费形式的多样化一样也不能少，而其中定价的合理和稳定，无疑至关重要。

同样的国际案例也给我们启示。为了在后疫情时代尽快恢复电影市场，法国从2022年三月开始，实施年度降价电影票计划，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响应，单在七月份就吸引了320万观影人次，达到了疫情前同期的水平。另有一些国家则推行国家电影节，节日当天影院票价全部实行半价，以吸引社会和观众更多的注意力和参与度。自然，更多的观影人次不一定意味着即时的更高票房，但从长远看，对于电影市场的巩固和开拓则一定是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

那么，哪些要素是我们在当下确认电影票价时需要特

审判席与被告席，两侧则留出展现虚拟的生活场景。

由亚洲人操刀打造的音乐剧又会呈现怎样的形态？无法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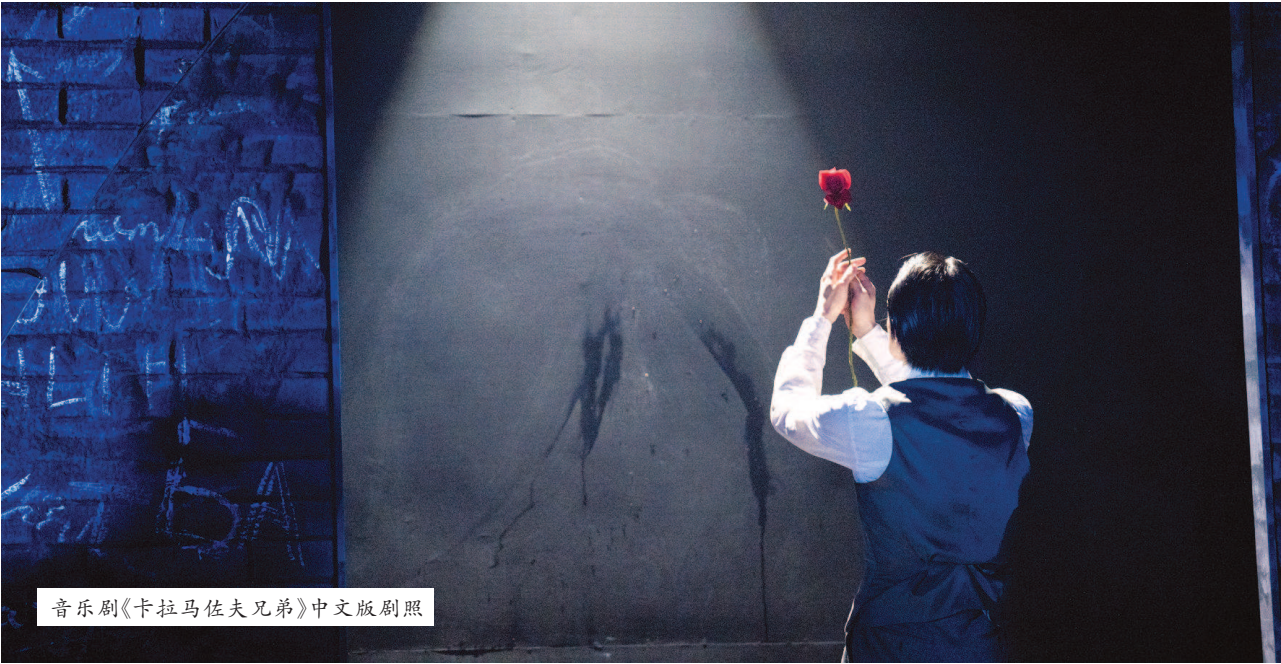
我想起去年曾看过一部本土演员演的、由俄罗斯人托托尔斯泰著名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同名音乐剧，布景美轮美奂，场面豪华多变。但走出剧场的我却难掩失望，主要人物安娜和渥伦斯基的情感纠葛是那样流于表面，缺少了原著所蕴含的思想力度，仿佛一只经不起推敲的精致薄瓷花瓶。音乐剧这个特殊载体，是否能承载《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深邃的思想与艺术观念互为交织的庞大话语系统；是否会出现俄罗斯文学史家米尔斯基所担心的“第四种阅读方式”的效果：不关注小说的哲学内涵，而视之为情节离奇的纯小说呢？我不由为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捏了把汗。

令人没想到的是，面对这样一部近70万字的典型“思想小说”兼“心理分析小说”，音乐剧采取了大胆甚至是冒险的方式，两个字概括：简约。

通俗说就是做减法——原著中重要人物近40人，而在这次音乐剧中，我们看到的出场人物就五个，即卡拉马佐夫家的老父亲和三个女人生下的四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次子伊万、幼子阿辽沙，及私生子斯也尔佳科夫），这五个个人撑起了一张人物关系的网路，蕴含伦理道德。“谁是凶手”则作为贯穿全剧的主要悬念，上半部分由生者与生者（四个儿子）、生者与死者（父与子）之间的对话构成；下半部分则是作为死者的老父亲变成一位旁观者，目睹四位儿子之间的相互追查、拷问。从“谁杀了父亲”到“谁更想杀死父亲”的追问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各自的懦弱、畏惧、愤怒、羞耻，在一场暴风般的“倾吐”之后，爱意开始在兄弟与父子间被发现并滋长……整部剧高度集中，较好地利用和展现了戏剧本身的形式特点。

“简约”的另一突出之处是对场景和音乐的处理。

它与莫斯科艺术剧院附属高等戏剧学校的舞台空间处理一样，也是一景到



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剧照

底。“莫艺”场景集中在法庭审判席和被告席。而该剧的舞台正中则是一具孤零零的棺柩，整体氛围犹如置身教堂。巧妙的是，音乐剧场景在灯光的作用下可虚拟变幻为墓穴、居家乃至地狱的象征；同时，舞台在左右前后四角落安置了分属四兄弟的“候场”区域，使演员始终“在场”；左后角是一扇牢门，属于长子德米特里，他是“肉体”的象征者；右后角是书柜，象征着“理性”的次子伊万在那里沉思；左前角设有神像，那是具有“精神”象征的老三阿辽沙的祈祷之处；右前角的烛台，则留给了代表“被侮辱被伤害”的私生子斯也尔佳科夫。正中的棺柩，则是死者老卡拉马佐夫的“天地”，五个有血缘关系的男人既是被审判者，又是审判者，最终落在契诃夫的那句话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作为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唱”也体现了简洁而丰富的特点。全剧唱段不算太多，但让人有记忆点的唱段却不少。在剧中，唱段主要用来表现人

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剧情线则靠人物之间说台词来实现。说它简洁主要体现在从头到尾只一架钢琴完成伴奏，然而，始终在场的琴声，实际上是除卡拉马佐夫家五位男人外的第六位重要“角色”。*光明与阴暗交织错落的林面，曾经蝶群翩翩，旧时光跟随蝶影纹理慢慢浮现，睁开眼，现实如残蝶，片片碎裂，而她泪流满面，沉默无言，伸手轻抚我的脸……”我最喜欢的还是阿辽沙与伊万共同回忆儿时情景与母亲的这段双人唱段《在衣柜里》，是那么如泣如诉，令人潸然泪下。

韩国导演吴世锡虽是个80后，但他以超越年龄的朴素想法参透了加与减、简洁与丰富的辩证关系，他的“舍弃”为这部巨著腾出了足够当代年轻观众回味无穷的思想空间与审美空间，让名著得以重生，从这部音乐剧的绝大多数观众都是年轻人来看，他的改编是值得深思的。根据作家的本意，作品的主人公是第三个儿子阿历克塞（剧中的阿辽沙），他既是“精神”的象征，又是“纯洁”的化身。但读过原著

小说的人都有一种同感，最为生动的其实是“坏人”。音乐剧呈现出的演出效果亦是如此，最具张力和生动性的人是老卡拉马佐夫，其次是杀父同谋者、次子伊万，随后是与父亲争风吃醋的长子德米特里和真正的凶手、私生子斯也尔佳科夫。“正面人物”阿历克塞多少显得苍白，这完全不能怪饰演阿辽沙的演员，因为原著的基础就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也有这一倾向，但不要据此认为他就是“恶之花”的赞美者，有研究指出，陀氏“注重人的邪恶，不是为了说明人性本恶……他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人的多方面性，从这个现实主义的基础出发，达到对人本性及其发展特点的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执拗地表现恶人、罪人及污浊黑暗的生活环境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虐待农奴、酒色无度，最后是自己的马车夫联手其他农奴将其处死，老卡拉马佐夫身上有着作家父亲的影子。陀思妥耶

夫斯基曾因偶尔参加了一次激进组织的活动，而被沙皇的密探局抓捕并判为死刑，但在行刑的最后时刻获得改判。这次经历在作家灵魂深处留下深深的伤痕，几乎终身未愈。之后，他又以囚犯的身份流放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要塞，四年苦役终日与杀人犯、窃贼为伍，在那里，他幼年的癫痫病越加严重，且发作越发频繁，所以在他的几部著名作品中都有癫痫病人的形象。《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私生子斯也尔佳科夫只有在癫痫病发作时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

作家恢复自由后，又与一位后来被他称之为“地狱般”的女作家苏斯洛娃发生过一段感情，两人在德国赌输大量钱财，这位女作家“似乎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地窥见了生活的黑暗面”，作家根据这段经历创作了小说《赌徒》。2016年，我曾到过作家遭遇厄难的这座城市，位于德国中部的黑森州首府威斯巴登，德语的意思是“草地上温泉”，也是葡萄酒“雷司令”的故乡，在当地最有名的腓特烈大帝温泉和威斯巴登温泉浴场的后花园里，设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瓦格纳等人的塑像。

跌宕起伏的亲身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显著呈现出“独特的双重人格”，在米尔斯基看来，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历史层面，陀氏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人。屠格涅夫则把他比作“俄国文学这个鼻子上新长出一颗粉刺”。另一方面，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几乎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黑暗、混乱的世界发现和塑造美好人物”，就像列昂捷夫在谈到其作品时所说：“在道德上崇高的东西，肯定要以生命的难以忍受的悲剧为前提”，“一方面是悲伤、屈辱、激情、罪行、嫉妒、压抑、错误，另一方面是意外的慰藉、善行、宽恕、心灵宁静、冲动、献身、单纯、心灵欢悦。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和这片天空下唯一可能有的和谐。这是一种和谐的奖惩规律。这就是把光明和黑暗诗意般地调和在一起”。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从一档综艺看大众对国家安全的认知误区

肖军

作为互联网普法综艺节目，《大侦探（第八季）》（以下简称《大侦探》）在每一案都设有《大侦探合议庭》栏目，邀请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和社会学学者从法律、社会学等角度来分析案件。节目还在微博上新增设了#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包括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在内的全国五所政法院校予以特别支持。

但略显遗憾的是，可能受限于其“普法教育推理节目”的定位，无论是节目所邀请的法官、学者抑或是互动的网民，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国家安全角度对案件进行深入阐释。

在第八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围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主题，对该节目中的案件进行解读，或有助于帮助公民更好地理解国家安全并走出国家安全认知上的误区。

首先，不可将国家安全仅理解为传统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其中五对关系之一就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区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从《大侦探》来看，目前仅是《芒城之风云再起》一案所配套的《大侦探合议庭》提到了国家安全这一话题。在该案中，不同国家动用间谍手段对芒城所在国的国土“幸福岛”进行争夺，涉及国土安全，确实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但国土安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并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同时，谈到间谍渗透问题，也是以传统思维来看国家安全的。现实中，诸多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反间谍防谍，而是要有更多的措施和方法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领域重大风险。

由此引出第二点，即不可忽视新型安全领域的风险挑战。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新型安全领域不断涌现，其出现和后续变化容易被人忽略。比如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生物安全等。在《离开星球表面》案件中，因为地球资源枯竭，各方争夺太空资源，影响到了太空安全；而在《飞越疯人愿》案件中，院方拿人的基因样本做实验，本身就违反了有关规定，甚至可能会威胁

到生物安全。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我们身边随时可能出现“灰犀牛”“黑天鹅”。不仅非洲猪瘟疫情、沙漠蝗灾等在内的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物疫情等传统生物安全威胁不断加剧，而且关乎精准基因工程技术、数字基因组技术等新型领域的生物安全威胁也时有发生，所以确保我国生物安全，就是要防范传统和新型生物安全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也就是说，现在国家安全不再仅仅是找间谍，还要找“动物”。这也是新国家安全法取代旧国家安全法的原因所在，体现出国家安全领域的变革。太空安全、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和新型安全，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再次，不能完全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分开。

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区分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但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影响。在《芒城之风云再起》中，主要是国土安全受到了威胁，但是由国土安全威胁引发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频发，这就是传统安全影响了非传统安全。在《芒州诡事录》中，《大侦探合议庭》在讨论青少年犯罪时，谈到互联网文化，如部分外国视频会错误引导青少年的价值观，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有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不好的话，极有可能反向作用于传统安全，颠覆国家政权，这便是非传统安全影响了传统安全。所以公民需要树立意识形态安全意识，自觉抵制不良文化侵蚀，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领域自身也会相互影响。一是网络安全成为新的打击手段，通过网络攻击窃取大量的信息与数据；网络电信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也是在掌握了诈骗对象信息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的。三者并非独立而是有关联的，其共同作用导致风险激增。二是同一领域的非传统安全也会相互影响，如《黑金大劫案》中涉及社会安全各领域，包括扫黑除恶、反腐倡廉、反电信诈骗、打击贩卖毒品、赌博、洗钱、仿画、假钞等犯罪。黑社会性质

犯罪集团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还腐蚀了官员，社会安全领域相关勾连，一系列反应导致社会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所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我们用系统思维来理解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领域的安全转化问题和共同的防范化解问题。

最后，不能割裂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离开星球表面》《飞越疯人愿》等诸多案件中，谈到了生物安全、科技安全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如只有维护生物安全，才能全面提升我国健康科学的整体创新能力，加快生物医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以安全促发展。2021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法律的变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目的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防范化解科技领域的重大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之一是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这里有一个变化。之前是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而现在加了“科技”，说明了科技安全的重要性。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我们不仅不能让科技的负面影响破坏了国家安全，还要用科技安全来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促进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总体而言，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教育过程要注意上述误区；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国家安全意识的落实。维护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国家安全机关的事，而是每位公民应尽的责任。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及其机构和职责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构建“大安全”格局。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泛化国家安全，也不能狭义理解国家安全，只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全社会共同参与维护国家安全，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要通过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来实现。当然，《大侦探》本身而言，如果能够进一步引入国家安全教育环节，就更能体现其社会意义了。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教授，刑侦剧研究中心主任）